

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香港) 晓晓[1]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陆改革开放提出的新概念，强调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绑在一起，照叶利钦的名言，是刺猬与蛇的强迫婚姻，肯定弄不到一起。[2] 本来，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马克思推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用来取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概念上是有你没我的相克关系。俄罗斯倒是干脆，明确就是要搞纯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休克疗法和私有化，一举培育出垄断金融、控制媒体、操纵政局的寡头利益集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民经济一蹶不振。[3] 彻底的资本主义搞成“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75%的经济活动是企业之间通过易货贸易和相互欠帐的方式进行的”。[4] 随着苏联解体，共产党下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只有中国大陆红旗不倒，拿刺猬和蛇弄在一起，不争论了20年，繁荣发展了20年。

大陆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为了推行改革开放，在“四个坚持”的框架里，填充市场机制的内容。20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农村包产到户、城乡私有经济、工农业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家住宅商品化、房地产市场、股票期货市场、各色金融企业等等，市场机制一路快马加鞭地填充。调动向钱看的积极性，蔚然形成社会风气。改革开放与“四个坚持”，为什么总是一手硬、一手软呢？——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恐怕是理所当然。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方面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犯罪猖獗、信仰危机。一个邪教法轮功，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搅的举国上下不得安宁。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逐渐归拢到一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向何处去？

(一) “转轨”概念的逻辑陷阱

改革开放的集约单词是“转轨”，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轨。东欧、苏联、中国、越南，除了一个北朝鲜，整个

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忙于从计划到市场的体制改革，都属于“转轨国家”。苏联解体以后，专门研究转轨的学术机构遍地开花。世界银行办《转轨通讯》，探讨内容既包括东欧、苏联，也包括中国、越南的改革经验。[5] 怎样转轨成为一门学问。

学问里曾经有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大陆拖泥带水的渐进式改革好，还是波兰、俄罗斯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好？早在1986年，中国曾经差一点实施价税财联动的综合改革。毕其功于一役也好，长痛不如短痛也好，渐进平稳过渡也好，目标都是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所有的学问，只在转轨的先后秩序（先价格改革还是先企业改革）、速度快慢（价格双轨制还是价税财联动）、程度深浅（国有企业股份化还是彻底私有化）。怎么说，转轨不就是从甲轨扳道岔，转到乙轨？很多经济学家始终相信，俄罗斯经济一定复苏，而且一定迅速超过中国，因为俄罗斯实施了更彻底的转轨，休克疗法和私有化一步到位。大陆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搞不好，归根结蒂，原因还是国有资产没人负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入WTO，经济体制与国际惯例处处接轨，政治体制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为什么国有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产权改革，迟迟不能全面彻底大规模合法展开？是因为“四个坚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渐进平稳也得往前走啊！东欧苏联的改革开放也是转轨，完全没有委婉妥协，一杆子插到底，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政治体制上从集权专政向议会民主转轨，在社会形态上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所以，共产党下台，成为彻底转轨的政治前提。

中国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从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根据东欧苏联转轨的一般逻辑，彼岸是确定的，难题只是如何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不要一脚踏空，人仰马翻。“渐进”是为了路上安全。转轨过程中的所有探索，说到底，是如何到达彼岸的方法和步骤。另一种理解是，改革的彼岸不确定，彼岸本身是求索的目标。“渐进”是为了在实践中摸索道路。同样都是转轨，对前者来说，彼岸清楚，值得探讨的只是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是否找到了石头；

对后者来说，彼岸不清楚，难以判断哪一脚是前进，哪一脚是倒退，推动改革是为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前者是找石头；后者是找彼岸。彼岸确定，只有前进倒退、改革保守之分，决无标新立异之志；彼岸未知，实践中一切土洋结合行之有效之法，都可能是产生新物种的变异基因。对找石头者而言，改革的对象就是 30 年的计划经济，转轨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层面与国际惯例全方位接轨。对找彼岸者而言，今天的改革，是 1840 年以来，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探索民族振兴之路的继续。彼岸确定，“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捆绑夫妻，逻辑上说不圆，实践里行不通。只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稳定离不开共产党，只好摸着石头慢慢来。共产党下台或者共产党自己渐进转变成社会民主党，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社会主义太超前，回过头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彼岸未知，恰恰是刺猬与蛇的婚姻，具有繁殖出新物种的可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对前者，确定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对后者，确定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避免重蹈旧中国的老路。两种不同认识的出发点，理念上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初期，从计划管制的极端状态出发，要的都是发展市场经济，很容易成为志同道合的同路人。随着改革的深入，具体政策取向的认识分歧，越来越涉及深层的不同理念，思想路线上的分道扬镳越来越明显。

在中西方文化结合的抽象层面，问任何一个说话负责任的知识份子，回答一定是：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要中西结合。再问：西方有什么好？— 商品经济、市场调节、平等竞争、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责权明确、科学管理、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生态保护、人权关怀，等等等等，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再问：中国有什么好？…… 如果体制上没有什么优势，我们拿什么和人家结合呢？于是，抽象意愿上的结合，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变成转轨，转上国际惯例之轨。

国际惯例正在变成美国惯例。让巴顿打得狼奔豕突的德国青年崇美，让原子弹炸得血肉横飞的日本青年崇美，杀得血流成河、把

美帝高科技打得屁滚尿流的越南青年也崇美。这是为什么？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强国、富国，是世界各国努力追赶的目标，奋斗的方向。笔者曾经在美国读过几天书。一般美国教授的教育哲学通俗易懂：美国先进，中国落后，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先进。中国想通过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当然是体制上改得越象美国，经济发展越快。中国在九世纪、英国在 19 世纪，曾经同作如是想、如是说。在唐朝，中国人把其他民族称“蛮”称“番”，一概视为茹毛饮血的初民，远没有今天美帝的人权诉求来得客气。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静态横向比较，先转轨而后接轨，是唯一现成的逻辑。而且，转得不够好，人家还不让接，想接还接不上呢。可是，动态纵向分析，曾经独步江湖几个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了呢？

根据人们不厌其烦的考证索引，还是因为没有及时向西方转轨的缘故。最典型的，莫过于所谓“李约瑟难题”的讨论。李约瑟纳闷，中国科技全方位遥遥领先全世界几百年，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西方经济学家的回答十分轻率：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便宜，用机器不合算，所谓“高度平衡陷阱”是也。[6] 中国人的智慧，慎终追远得多多。既然工业革命已经发生在西方，深刻答案一定蕴含在提问中。从专制愚民的政治体制到不尚实验的科学哲学，从重农抑商的政策传统到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但凡与西方不同的地方，大都成为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7] 顺藤摸瓜，深稽博考，人家从希腊城邦时代，就讲究公民平等的民主精神。[8] 既然西方文明从三皇五帝伊始，就值得我们高山仰止顶礼膜拜，又何必两千年之后纡尊降贵，低三下四从中国引进四大发明呢？[9] 令人困惑的问题是，《马可波罗行纪》流传以后，几个世纪里东学西渐，整个欧洲掀起“中国热”，忙着向中国学习。公元 500-1500 年，“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10] 就算那时候就听了今天的，下定决心向西方转轨、接轨，学西方不就成了学自己，可怎么操作呢？

（二）超越决定论的进化公式

探讨中华民族振兴之路，需要深层次的理论思索。

僵化比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中国的大机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水

平，因此，不具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进化的物质基础。就算是提前建设社会主义，也要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甚至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仍旧不能奏效。50年代提出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20-30年不变，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0年不变，强调的不都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理论的尴尬在于，只要承认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就成多余。不仅如此，生搬硬套社会形态依次进化的公式，就算是时机成熟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也应当是生产力最先进的美国，而不是中国，率先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跃进。

长期以来，简单化的流行看法是，马克思循着欧洲历史的发展线索，给出人类从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化公式。[11] 这个高度抽象的公式，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相匹配，却不容易还原成具体文化、民族、国家的发展规律。原始社会不说了，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的颠峰。到了奴隶制再也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不是从罗马帝国内部产生封建主和农奴，而是原始野蛮的蛮族入侵，把欧洲进化到封建社会。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是一桩历史悬案，却创造了使西方瞠目结舌的中世纪文明。辉煌的程度，够得上“叹为观止”四个字。用马可·波罗的话说是，“盖我言之无论如何诚实，皆不足取信与人也”。[12] 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遥遥领先。古怪的是，充分发达的生产力，并没有突破生产关系的桎梏，繁衍出现代资本主义。倒是生产力远远落后的欧洲，向东方改革开放几个世纪，引进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各种先进技术，引进以钱庄纸币为代表的信用制度，引进科举考核为代表的文官制度，发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成百上千个分散的诸侯国，统一成足够疆域、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民族国家，成就了大机器生产方式和极具扩张性的资本主义新文明，打遍天下无敌手。[13]

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顺序进化的公式，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来奴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历史分期和长期停滞的原因，四大经典难题。中国究竟有没有过完整的奴隶制社会，需要总共一千多字的甲骨文，连猜带蒙，予以佐证。[14] 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专著，汗牛充栋，从战国到明清，众说纷纭。这两个问题一头一尾

闹不清爽，拿中国几千年历史，按照欧洲社会的进化公式断代分期，剪不断，理还乱。中国奴隶制结束得太早，资本主义迟迟未来，公元前就废除了分封的封建社会，当然显得太长，长期停滞的命题应运而生。[15] 历史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不管怎么论证，就算是中国几个社会形态一应俱全，严丝合缝，依然无法说明，为什么不是先进的中国，倒是落后的欧洲，创造了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16] 类似的疑惑是，原始野蛮的日耳曼彻底毁灭罗马文明，把欧洲推入六百多年的“黑暗时代”（Dark Ages），是更高级形态的社会进步？打破欧洲中世纪停滞不前的，是十字军东征带回的文艺复兴。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德、托勒密、阿基米德等西方文明奠基人的著作，全部是从阿拉伯文翻译回来的。[17] 恩格斯讲话：“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8] 言下之意，现代欧洲并非“黑暗时代”的直接延续。多亏了好学不倦的穆罕默德，否则，接不上希腊罗马奴隶社会落后的茬，欧洲岂不要在先进的封建社会永远黑暗下去？

较这个真儿，并非鸡蛋里挑骨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美国著名史学家沃勒斯坦的苦恼，值得同情：

马克思主义者接受进步的进化模式是一个大陷阱。……进步的思想为社会主义辩护，同时也就为资本主义进行了辩护。在向无产阶级唱赞歌之前，人们很难不先颂扬一番资产阶级。……由于衡量进步的标准是唯物的，进步的思想就可能被用来反对一切“社会主义实验”。

为了把自己与他所斥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马克思宣称他是在倡导“科学社会主义”。他的著作强调了资本主义“进步的”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最“先进的”国家产生的概念指出，这一过程将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同时也是作为它的反动）成长出来。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将效仿“资产阶级革命”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到来。后来的一些理论家甚至提出，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出现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协助资产阶级革命。[19]

东方落后国家，能否率先展开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能否超越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整整一个多世纪

里，成为东方国家社会进步的大是大非。[20]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能动作用，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哲学工具。关键是准确把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一般从特殊中来，存在于特殊之中，却不直接等同、不能直接还原于特殊。一般对特殊的指导意义是哲学的抽象，不是代替具体实践的先验公式。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值得学习的光辉典范。

（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转轨国家过去实行计划调拨。发展商品经济，是所有转轨国家体制改革首当其冲的任务。改革的对象是破除计划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对不少经济学家来说，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定义，没有比这更丰富的其它内容需要研究讨论。

东欧苏联诸国，历史上商品经济不发达。不管叫什么主义，补上这一课，或许在所难免，在劫难逃。同样的故事放到中国，文不对题了。中国的商朝，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商品经济发达才起的名字。[21] 中国几千年停滞不前，近代以来落后挨打，不仅不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发达，很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经济太发达，早就一次又一次发达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程度。

西方封建社会的建立，是日耳曼蛮族席卷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前后持续近两个世纪（376-568年），摧毁腐败的罗马帝国，沿袭原始马克村社制度，分封土地和人民。人民从奴隶逐渐变成隶农、农奴，与大块土地一起依附贵族，组成庄园经济。庄园内部是农奴为贵族贡献无偿劳役，农奴之间换工和物物交换。大庄园里通常有铁匠、木匠、车夫、磨坊、兽医、理发师、牧师，万事不求人。[22] “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甚至军费也是征收实物。没有商业往来和交换，用不着货币。” [23] 直到13世纪，“有产阶级的生产几乎不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几乎不消费任何非本地生产的物品。”商品交换极不发达。14世纪的法国，“度量衡因省而异，因城不同。……有时在同一城市里，度量衡也各不相同。……每到一处，商人都必须对他的商品按当地量制重新量度。” [24] 法国是到大革命时代（1793年），德国是到俾斯曼时代（1871年），才统一列国，统一度量衡。中国早在公元前两百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就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 [25] 中西比较，实现商品交换的同样条件，欧洲比中国晚了两千年。 [26]

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庭经营，从来不是欧洲庄园式或俄国村社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中国市场经济高度早熟的生产方式基础。

古代农业生产，直接依赖自然条件。与欧洲平原气候湿润稳定的自然条件相比较，中国天上是独特的大陆季风气候，西伯利亚、帕米尔高原的干燥冷空气和太平洋、印度洋的湿润暖流你来我往，温度变化大，四季分明，降雨极不均匀。地上 70% 的国土是山地丘陵，土地零碎分散，起伏高低不平。天上地上的自然条件叠加一起，各种动植物物种极其丰富，各种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极其频繁。 [27] 本来就没有欧洲北美那种大面积单一品种的原始植被，农业生产自然不适合单一作物大面积种植。陕北老乡种地，到今天还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倒春寒”毁了小麦，还有糜谷；洪水冲了川地，还有山地；“卡脖子旱”谷子欠收，还可以赶一季荞麦；春天小麦套油菜，夏天玉米套土豆……分散细碎的地块，高低不平的地形，变化多端的气候和降雨，纷来沓至的自然灾害，多样化的作物种植，加上深耕细耨、复种套种、施肥倒茬的复杂耕作，宏观上需要大规模水利建设和救灾赈济，微观上需要精细集约的个体家庭多种经营，不能象西方庄园那样，单一作物大面积集体粗放生产，通过庄园或村社内部的简单分工，实现自给自足。 [28] 中国农业一方面需要高度集中，一方面需要高度分散，造就了独特的社会组织制度和传统文化。就是到今天，农村包产到户改革之后，就算是实现了土地连片集中，在 400 毫米降雨线以内的主要地区，北美玉米带式的大农业生产，照旧不可想象。 [29] 所以，告别郭沫若论证的《奴隶制社会》以后，中国从来没有进入欧洲庄园式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家庭多种经营，从来就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赖商品交换的体外循环才能维持。 [30] 所以“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

之本，兴自神农。” [31] 孟子反对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一段著名语录，是小农经济离不开商品交换的经典说明：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否？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32]

币材是比较东西方商品交换在社会深入程度的重要指标。西方古代商品交换多用金币，中国从始至终广泛使用铜钱，被韦伯当成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证据。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创始人，却不了解王莽“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的道理。 [33] 西方古代用贵金属作币材，交易对应的货物，要么是大宗普通货物，要么是与贫穷百姓无关的奢侈品。交换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庄园与庄园之间。而且，与贵金属货币相联系的是远程贸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余”，是汉朝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 [34] 就是铜钱，数量一多也背不动。所以，西方古代商品交换，是少数贵族的事情。“他们的货币实际上没有深入民间；即到近代，还有许多人终生没有见过一次金币”。 [35] 所以恩格斯说：“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36] 中国外圆内方的低价值铜制钱，是秦始皇统一的货币形式，两千多年前开始，把民间的商品交换，普及到一粥一饭的程度。逢五逢十的赶集，逢年过节的庙会，大多在步行当天往返的距离。 [37] 走街串巷的小贩，路边的茶馆饭店，铁器农具，油盐酱醋，瓜果梨桃，针头线脑，剃头修脚，说书唱戏，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孔方兄”须臾不能离。

按照伦敦交易所 1998-2000 三年交易的平均价格，同等重量金、银、铜的比价为 1 比 59 比 5263。 [38] 古代金属比价，与当今不能直接比较。西方庄园主之间，一单以金币为等价物的商品交换，在中国小农家庭之间，可以分解成为成百上千次用铜钱的小买卖，应当是可以想象的。由于货币深入人心，中国的信用发育特别早熟。汉武帝时的皮币，已经具有信用性质。唐宪宗时的飞钱，更被史家视为纸币之滥觞。 [39] 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深入西北大漠和西南边陲，一路用元朝纸币能否流通，来判断是否还在中国境

内。[40] 欧洲直到 16 世纪掠夺南美银矿，才在社会层面，推动以银元为等价物的商品交换。到西方兴高采烈引进纸币的时候，经历过宋元几朝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王朝已经对劣币驱除良币的游戏心灰意懒，把纸币当成玩剩下的东西了。[41]

西方主导货币从金到银、到铜、到纸，标志商品经济从贵族到民间，逐次普及的深化过程。中国主导货币上手就是铜币，接着是纸币，然后是铜银并行，从来不存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命题。[42] 有了广泛商品交换的动力基础——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有了普遍商品交换的必要条件——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已经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了。[43] 中国政府从成为政府那一天起，除了治水救灾，主要的经济政策工作，就是协调食货关系。食与货平起平坐，吃饭和贸易并重。[44]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涌现出管子、计然、李悝、白圭等一批宏观经济学家，懂得谷贱伤农和农业周期的道理，设立贵卖贱买农商两利的平糶机制，已然是政府用公共开支，“逆风向”调节物价。[45] 西周《尚书》提出食货范畴，《史记》专开《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以后，历朝官修正史均设《食货志》，专门讨论国民经济里的食货关系。宏观经济调节，产业与商业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发达，是小农经济家庭经营的必要条件。多数传统分析认为，男耕女织的大部分产品，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商品交换。这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局就是“羊吃人”，把农业生产大面积转化为商品生产，目的明显不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追求的是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可是，依据经济学的边际理论，无论男耕女织的商品率多么低，只要生产者提供产品进入市场，市场价格必然成为所有产品或自我消费或出售的核算基础。何况中国农村的商品率从来不低。史料大量记载江南丝织、陶瓷、茶叶等产业，长期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专业化商品生产。美国人根据商业税收推算，1077 年，不算就近的集市贸易，全国农业总值的 20-30% 进入长途贩运。[46] 更何况当年欧洲一隅之地的“羊吃人”，也不是粮食全部进口哩。

（四）抑破坏产业之商

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被当成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首先发扬光大的原因。没有《威尼斯商人》贪婪的资本积累，日后不会有大款赞助瓦特发明蒸汽机。倘若是中世纪教会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重农抑商，资本主义肯定要被扼杀在襁褓里了。但是，中国发达的市场经济，战国时期，就培育出吕不韦这样冒天下大不韪的贾国巨商。齐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赌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47] 13世纪末，苏州、扬州、镇江、南京、福州等城市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市场之繁华，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叹为天上人间。[48] 如果能够把今人关于中国重农抑商的结论告诉马氏，老人家一定暗自庆幸：一个劲儿抑商还发展成这样。如果中国不抑商，哪里还有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活路？

食货立国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抑商？中国独特的小农经济，不仅需要市场交换互通有无，而且，深耕施肥复种倒茬的复杂耕作，需要土地私有权，调动农民爱护土地，培植地力。私人土地买卖，在中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市场经济深入到土地要素的自由交易，中国比西方早了两千年。[49] 有一得必有一失。一方面，土地经营需要多年持续。土地私有，鼓励农民“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50] 土地买卖，公平竞争。谁的地种得好，谁就应当经营更多的土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唯利是图，土地买卖本身产生收益，吸引商业积累加入土地兼并。“商人兼并农人”，很容易把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的初衷，转变成土地向有钱大款集中。

市场经济中的小农家庭，作为独立细小的经营单位，弱不禁风，吹弹得破。“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固然活得滋润。可是，耕牛一死，主要劳动力一病，就会一蹶不振；一场灾害，一次瘟疫，就会倾家荡产（为此需要家族的帮衬接济）。农业生产，季节周期。春天需要资金购买种子、农具、牲口和灌溉，秋天收获才有收入还钱。青黄不接之际，资金需求缺少弹性。“二月卖新丝，五月糞新谷”。要吃饭活命，再高的利息也得借。而且，全体小农遵循共同的生产周期，要买的时候都要买，要卖的时候都

要卖，要借钱的时候都要借钱。资金需求和还款周期，随农业生产季节同起同落，使金融成为小农经济的软肋。工商业经营的资金周转，不受农业季节制约。积累的资金，很容易趁农业生产青黄不接，转入高利贷经营。耕地作为借贷的抵押，演化成土地兼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51]

秦汉以降，中国反复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多不是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种田能手发家致富造成的。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千古不易。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商人为什么一定要“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呢？[52] 与窖藏金银的守财传统相比，当地主，吃地租，算是按时付息的银行了。但是，在机会成本上说，吃地租是否一定优于“依市门”，应当是可以比较的。[53] 按常理，只有在“依市门”不如吃地租的情况下，大批商业积累才会转入土地兼并。但是，如果“依市门”不如吃地租，大批商业积累又从何而来？传统地主流田问舍，通常没有扩大土地规模，推动现代农场化经营的雄心壮志。逻辑的答案只有一个：越来越多的商业积累（包括高利贷）转入土地兼并，追求的并非是地租，土地买卖本身就是赚钱的生意，而且经常是超过“依市门”的赚钱生意。换言之，在一个不能忽视的比例上，买地直接图的不是收租，而是为了再卖出去；即便是套住了，找不到下家了，还可以吃地租，还利息。用现代语言叫“炒地皮”。不同的是，在古代，地皮是唯一真实的信用，是所有人民安身立命之所，是所有失去土地的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于是，贱买贵卖的土地，成为商业积累的用武之地。[54]

商人买地多为“鬻时可以得善价”。热闹起来，经常也是“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中国北方历来有“年头歉一歉，地主圈一圈”的说法。清朝嘉庆年间，“直隶大名府 30 余州县，前因连年荒欠，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直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55] 年成一好，失去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但凡有些许积蓄，祖祖辈辈能够想象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小块土地买回来——当然不可能是卖地时的地价了。即便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地主-佃农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阶级形态，农民只要有钱，首选还是买地。于是乎，广大农民贱

卖贵买，少数商人贱买贵卖。农业生产，家庭经营，市场经济，土地私有，组合成就土地投机广泛而持久的沃土。

“在光景好的时候农民买回来很多土地，而在困难时候又再度失去土地。” [56] 农民贱卖贵买和商人贱买贵卖的游戏，在经商的富人和务农的穷人之间，高度不对称，几乎不存在收敛取向的运动均衡。首先，一目了然的是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普通农民靠种田收益买回土地，十分辛苦。第二，与打扑克争上游缴贡的道理一样，地租一旦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缴租之后再攒钱买地，越发不易。第三，自耕农转为佃农，对土地势必掠夺经营，地力逐年下降在所难免。这会进一步迫使佃农承租更多的耕地，激化地租竞争；而且是地租越高，越得多租地。 [57] 结果形成恶性循环：地租竞争越激烈，掠夺式经营越普遍，土地的生产力越下降，单位土地可以养育的人口越少，游离出土地的流民越多，地租竞争越激烈，佃农恢复自耕农身份的希望越渺茫。

在这个基础上，两方面的因素添加进来，会使土地买卖游戏，逐步加速进入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境界。一方面，农民贱卖贵买土地越是经常发生，越是吸引更多商业积累投入土地买卖。历代都有豪强富户争购土地的纠纷记载。富人之间的土地争夺，当然哄抬地价。另一方面，政府修水利、修长城、养皇帝和官僚机构，需要老百姓供奉租庸调。自耕农减少，经常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育的国家，货币贬值成为历代政府缓解财政拮据的有效手段。通货膨胀明显打击民间商业金融，驱使更多的货币积累进入最有信用基础的土地兼并。王朝末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更使得土地兼并成为比窖藏金银更优的财富保值、升值途径。

当然，古代的土地兼并，与当代的房地产泡沫、开发区热，程度上不能相提并论，不宜过分夸张。首先，一直到唐朝，中国南方尚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发达地区地价上涨，无地农民流亡到尚未开发的南方拓殖。战乱之后，政府往往能够用大片荒芜土地招徕流亡，修养生息。 [58] 其次，历代地价上涨，人口增长是重要推动。不过地价上涨比人口增长快得多，有时高出一个数量级。譬如，清人就有雍正后 50 年时间地价上涨 20 多倍的记载。 [59] 第三，古代交通、信用、人口流动发育落后。更重要的是，官方种种重农抑商

的政策，或者干脆直接用行政手段抑制豪强兼并土地，经常可以把土地买卖限制在一个不十分“过热”的水平。所以，同样一场投机游戏，在古代可以旷日持久地玩上百年时间。

即便如此，有广大农民经年累月的广泛参与，不管政府怎样大力重农抑商，土地投机总是能够深入持久地展开。透过残缺零碎的资料和描述，到处可以辨认佃农越来越多、地租越来越高、土地越来越集中、地价越来越高的赌博泡沫。譬如，在长江三角洲，到康熙 20 年，地租占当年收获的比例达到 60-80%，上升到佃农经营的极限——再加租，地就没人种了。从清初至道光年间，“土地购买年”（地价/年地租）从 8-9 年上升到 10 余年到 20 余年不等。[60] 地租率极限之上的地价持续上涨，投机的泡沫成分昭然若揭。[61] 明代后期，顾炎武看到，一方面是“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做者什九”；一方面是“千年田，八百主”。[62] 土地买卖不是针头线脑的小生意，随便一块地，几十两银子是平常事，资金规模门槛极高。遥想当年生产、交通、通讯、信用发展水平、资金周转速度和人口流动水平，土地转手如此频繁，炒作泡沫脱离实际的相对程度，应当可以和现代房地产投机媲美了。王朝后期高频率的土地转手，倒茬轮作深耕细耨培植地力，肯定谈不上了。到疯狂掠夺式经营和大面积土地撩荒的时候，土地买卖的游戏就玩到头了。

现代房地产泡沫玩完了可以炒股票，股票泡沫玩完了可以炒期货，期货泡沫玩完了可以炒外汇……这个玩完了换那个，玩了国内玩国际。中国虽然地大物博，古代农业社会，产业层次毕竟单薄，不具备现代产业纵深的广阔天地。土地买卖玩到头，没得戏换，只有重新洗牌。中国历史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描述的通常不单纯是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凸显出大量无业流民和大面积土地撩荒并存的矛盾现象。土地炒作者“知兼并不知尽地之利”。高价投机买地，吃点地租和找到下家翻本相比，是芝麻和西瓜的关系。“炒股炒成股东”与“泡妞泡成老公”，再说有股息分红，套牢蚀本的情理是一样的。如果是借高利贷买地，只有提高地租，还些利息，总还聊胜于无。于是乎，租越收越高，地越种越薄。地租高到当年收获 70-80% 的程度，一季年景不好，就可以使佃农弃田流亡。譬如，中国近代土地 60-70% 集中在地主手里，

“不在地主”拥有所有出租土地的四分之三。1922年，九亿亩土地撩荒，占全国耕地和园圃面积的一半以上。[63] 四处打工的流动人口两千万。[64] 到了这种时候，社会动乱由小到大，用十室九空的代价改朝换代，成为屡试不爽的规律。秦末的陈胜吴广，西汉的赤眉绿林，东汉的黄巾军，隋末的瓦岗寨，唐末的黄巢，宋末的宋江方腊，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末的太平天国，一直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历朝历代，无一例外。

从促进小农经济的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到破坏小农经济的土地投机和土地兼并，到天崩地裂的改朝换代，中国土地兼并的教训铭心刻骨。英国的圈地运动是“羊吃人”，中国的土地兼并是“商吃人”。不同的是，欧洲土地贵族分封。11世纪英国威廉一世大兴封建。荒山森林收归王室。“全国的耕地面积约有五分之一多归王室领有，教会约占四分之一多，世俗贵族约占二分之一多。”[65] 哪里还有普通百姓买地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领地范围的司法统治、度量衡、铸币权、税收地租，统统与分封的土地所有权，交叉混合在一起。即便到封建社会晚期，农奴耕种的份地日益固定，进化成交租的佃农，阶级地位仍然不能望中国佃农之项背——后者只要有钱，随时可以变成地主。英国的圈地运动是贵族夺佃养羊，“在整个圈地运动中没有使用货币”，自然没有土地投机。[66] 相比之下，中国直到20世纪，70%的农户至少拥有自己耕种土地的一部分。[67] 广大农民贱卖贵买土地，而且经久不衰，这是西方土地兼并与中国的根本不同。结果，英国的土地兼并为发展毛纺工业服务，资本主义拉开序幕。中国的土地兼并是商品经济市场调节的自然结果，没有新兴产业推动。土地自由买卖几千年，早就是全民参与的大产业。倘若土地买卖的收益率经常超过“依市门”，自然超过工业投资，这恐怕是大机器生产没有先在中国启动的重要原因。土地买卖吞噬有限积累，新兴产业没有发展前途，只是“千年田换八百主”地玩下去，如果不想改朝换代，除了抑商，别无出路。

中国历朝历代努力抑商，到最后，终于抑出一个19世纪海外扩张的大英帝国，只能靠鸦片平衡贸易逆差的出口生产力。[68] 中国的小农经济，从来离不开市场交换。历代政府食货并重的重农抑

商，至少从主观愿望上，真正努力要抑的，不是互通有无之商，不是农民土地买卖之商，只是商业积累转变成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汉朝的限田，唐朝的均田，都是为了耕者有其田。[69] 王安石的青苗法，则是从农村金融上想办法的典型。清朝强推永佃制，保护佃农能有一块持续经营的土地，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当代中国的农村改革，通过包产到户回归家庭经营的小农传统，唯独没有恢复土地私有制。损失的是农民对土地多年持续的培植，土地适当集中的农场规模效益；得到的是几千万上亿的农村民工，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公民权益缺乏基本保证，到处流动讨生活 20 年，社会始终保持总体稳定。

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马克思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成反比例的。”[70] 中国食货并重的重农抑商，翻译成现代语言，是重产业发展，抑制脱离物质生产、破坏产业发展之商。早在汉代，王符就知道商业本身也有本末之分，提出重本抑末发展商业的指导思想。[71] 商业互通有无，一定刺激不同产品的物质生产。问题复杂的是，商业之“本”是互通有无，经商需要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一旦产生，脱离物质生产的商业之“末”自然应运而生，钱生钱的投机赌博与生俱来。什么该抑什么不该抑，政策界限很难把握。譬如什么是赌博？常识很容易判断，经济学逻辑或者政策管理上的定义就难了。一只股票你看跌，我看涨；下注，跌了我的钱给你，涨了你的钱归我。这样的交易虽然也是信用，却是标准的赌博，因为与物质生产没有任何联系。完全一模一样的游戏，拿到股市里就成投资了，因为有第三者参加，买卖了真实的股票。虽然真实的股票也是信用，却与真实的物质生产相联系。问题是，如果这种联系，随着信用交易的发展越来越弱了呢？

譬如，期货交易起源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经营。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弹性小，农业生产具有固定的季节周期性，套期保值的期货交易，几乎为安全从事商品化农场经营所必须。套期保值的前提是有人乐意投机。谁知道，投机者一来，整个期货市场变成了赌场，实物交割不到交易总额的 1-2%。如今，“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

计的货币交易中，只有 5% 涉及到贸易和其它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 95% 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 [72]

赌博泡沫也好，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的脱离也好，现代信用的膨胀足以证明，资本积累与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之间，不仅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可能严重伤害后者。货币汇率大起大落，跨国公司都难以安排生产计划。短期投资大进大出，国家的宏观调控都无所适从。2001 年 3 月，美国股市暴跌，一周时间，纳斯达克和道·琼斯股票缩水近两万亿美元。[73] 五个工作日玩完两个中国的 GDP 总额。如果谁想发展物质生产赚钱，走这条路，不是找死吗？为此，连索罗斯都写了好几本资本主义危机的书。西方学者呼天抢地，要对资本投机征高税，不得不抑商。亚洲金融危机，外资大鳄冲击香港股市，特区政府放下“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身段，亲自下场，埋身肉搏，不得不抑商。中国转轨跟着玩金融，广东两家企业（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粤海企业集团）光外债就欠了一百多亿美元还不上。省政府没钱还帐，只能破产一个，重组一个，一举关闭八百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得不抑商……台湾当局干脆指名道姓，禁止索罗斯入场。人家索罗斯玩的全是合法交易。侵犯凌辱商人人权，如此直截了当，蛮不讲理，简直可以和汉朝政府挤兑商人的“贱商令”相轩轾了。

（五）市场经济的极致境界 — 赌博

耐人寻味的是，只要政府不抑商，商品经济市场调节，自然产生脱离物质生产的泡沫，自动无穷趋近纯粹的赌博。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如此，当代股市、期货、外汇交易如此，金融衍生工具和非法集资更是如此。道理何在？商品交换的本质逻辑就是赌博。任何一单货物从甲地运到乙地，秋季买进春季卖出，先交的钱是赌注，后收的钱是平仓交割。对生产者而言，商品交换互通有无，促进生产；对交换者而言，交换的动力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尽可能快的速度得到尽可能多的回报，投资下注的对象是货物、是货币、是筹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赌博恰恰是商品交换中多快好省的极品，而且是最公平的交易。发展商品生产，就算是完全排除了政府干预，照样四处碰到先天不足的不平等竞争。炼铁得有矿山，煮盐得靠海边。电讯改革，电讯基础网自然垄断；电力改革，输电配

电网自然垄断。即便都是“依市门”，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服务，长得五大三粗，就是赶不上花容月色的生意红火。唯独赌博，男的女的，美的丑的，大字不识的文盲，海外留学的博士，农村户口美国绿卡，将军士兵总统囚犯，一律平等，大压小，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而且，交易成本是所有商品交换中最低的。尤其是互联网高科技的应用，连赌场里大呼小叫的情绪干扰都免了，数字对数字，光速成交，自动划帐，小葱拌豆腐——没有垄断寻租，不用质量检查，再也找不出比赌博更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换了。赌博是市场经济的极致境界。

世界各国从古到今禁止赌博。按说赌博又不是抽烟酗酒吸毒，对身体健康无害。只要不赌老婆侵犯人权，赢房子赢地，都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不是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吗？用神圣财产下注，政府凭什么禁止呢？查遍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找不到赌博违反公平交易的经济批评。[74] 禁赌的原因是不劳而获对物质生产的干扰和最高速度的两极分化。换言之，赌博表现出的辩证法是：最纯粹的市场经济，是脱离并破坏物质生产的财富分配——钱生钱的投机游戏；最公平的商品交换，导致最不道德的社会后果——最迅速的两极分化。多年来，转规国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造社会的目标，应当已有足够多的切身体会。譬如，“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叫‘皮包里的资本主义’，就是用钱生产钱。”社会急剧两极分化之后，新富们的财富只用于投机，不用于生产。搬道岔的结果是，“俄罗斯的资本同俄罗斯的生产分了家。”[75] 俄罗斯的转轨经验再次说明，有市场经济的投机赌博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大多数人共同富裕，没有必然联系。

商品经济市场调节，随贸易的发展互通有无，促进物质生产；又随信用的发展，产生不劳而获的投机赌博和风驰电掣的贫富分化，对物质生产发生破坏作用。过去有关剥削的分析，注重王朝后期的高额地租，没有经历现代投机泡沫的惨痛教训，很难细致描绘农民来回往返贱卖贵买土地付出的巨大代价。市场经济对物质生产，既促进和又破坏的双重作用与生俱来。古往今来的禁赌，只能禁那些没有买卖实物的干赌。买卖地产、买卖股票、买卖外汇、买卖期货，哪一单交易是破坏物质生产的赌博泡沫，哪一单交易是促

进物质生产的真实买卖，政策上很难区分。中国历代王朝，经济恢复时期鼓励商业发展，互通有无，促进生产；经济繁荣就抑商，希图缓解土地兼并；反映出市场经济对物质生产从促进到破坏的周期表现。现代大机器生产，无非是在农业基础上，极大拓展了物质生产的纵深；同时为市场经济以及信用赌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巨大空间。

商品交换和信用发展，自发产生脱离物质生产的倾向。不管买卖的题目是土地还是股票、是期货还是外汇、是赛狗还是跑马，不管对物质生产、社会安定带来多么严重的破坏，商品交换不停，不同题目的赌博不止。在商言商，唯利是图。商人队伍中每每涌现索罗斯式的人物，并不奇怪。古代索罗斯——阳虎公开标榜“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致富哲理，被孟子反用成为对商人的道德裁判。[76] 管子依据不同职业对社会可能发生的道德效果，给出“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与西方身份等级形成鲜明对比）。[77] 汉朝政府干脆多次颁布“贱商令”，禁止商人买地作官骑马穿绫罗绸缎花衣服。类似的社会压力或轻或重持续几千年，富却贱的煎熬代代相传，酿就中国商人的畸形个性。一方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唯利是图无所不为。早在汉代，就因为“以美贸恶，以半易倍”，博得“商则长诈”的美誉。宋商“贩米而加以水，卖盐而杂以灰，卖漆而和以油，卖药而易以他物，如此等等，不胜其多”。明商“多用膺银”，“溷杂贸易，欺侮愚讷”。清代商人“多机巧，能为伪物”。[78] 马可·波罗时期，缠着要在朋友胸脯上割肉的《威尼斯商人》，到中国成了小巫见大巫。直到法国启蒙时代，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还在为遐迩闻名的中国商人善于欺诈说而百般辩解。[79] 转轨以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苏联老大哥，又着实领教一把中国小弟坚持社会主义的经商能力。如今大陆提倡市场经济，假冒伪劣童叟无欺。商品经济发达到护照身份证有的卖，学位文凭有的卖，官爵职位有的卖，妇女小孩有的卖……毒酒、毒米、注水肉、添药面屡禁不止。喝假酒喝死人，已经不新鲜了。眼看着连吃米饭吃馒头，都时常有赔上性命的危险，得拿出“拼死吃河豚”的勇气。另一方面，象索罗斯办基金会、办大学、办医院、办救济一样，中国商人具有特别乐善好施的历史传统——越是不顾社会后果

地赚钱，越得大张旗鼓地施舍，以舒缓来自内心、家庭和社会的道德压力。[80]

（六）资本主义在西方是进步

欧洲封建社会，分封贵族拥有土地和人民。长子继承权的血缘身份，是政治经济统治秩序的纽带。性禁欲主义成为基督教的伦理基础。[81] 直到近代美国，从霍桑的《红字》仍旧可以读出，妇女贞操至高无上，胜过生命。与长子继承权和妇女贞操神圣化直接对应的是，贵族对农奴行使法定初夜权。西方社会的历史进步体现为，奴隶社会拿人当牲畜使唤，封建社会拿人当人奴役。甚至农奴妻女“行为不检点”都要受罚，因为“使领主的农奴血液遭受玷污”。[82] 直到18世纪末，因为嘲弄封建主的初夜权，《费加洛的婚礼》在欧洲各国禁演。[83] 如此欺人太甚的制度里，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突破封建传统，在城市用金钱把自己确立为贵族、僧侣之后的第三等级，在农村用圈地运动把农奴从份地上驱除，剥夺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到城市打工求生。封建主们地里全是羊了，四处找不着人，初夜权只好作罢，从此摆脱人身依附关系。[84] 马克思为此而欢呼：无论是生产力发展还是社会进步，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都是一次由彻底剥削人民推动的历史性进步。

拿这个历史性进步套中国，又方柄圆凿，文不对题了。由于地理气候的复杂性，中国农业生产，需要大规模水利建设和跨地区救灾赈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需要整个流域统筹调度，全体居民人人有份。早期部族分散独立，兵来将挡，水来土堰，各行其是。鲧治水失败，据说是“堵”的思路错误，其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禹接手以后，借着堵不住的大洪水变“堵”为“导”，顺势而上，顺流而下，“以四海为壑”，上下游统筹规划，统一号令。

“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并弱水、黑水，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有堵有疏有引有导，中央集权调配平衡各地利益。[85] 建设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设成有地方吃亏，有地方受益。一旦地方受灾，跨地区救灾赈济，中央政府责无旁贷（否则势必还原各行其是以临为壑）。[86] 虽然谁都可能受灾，是三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灾到什么程度，根本无法预计。所以，救灾赈济很难就事论事，自愿协商出帕累托最优；只

能蛮不讲理，一平二调。小农经济再理性，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这样治水的结果，必然是政治上大一统的集权专制。所以，大禹治水，青铜兵器南征北讨，地平天成的同时铸九鼎以定名分，“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尧舜之间推来搡去的禅让制度，从此变成父子相传的世袭了。春秋战国，封建割据，大河上下的统一调度月残花落，退回“以临国为壑”。为什么说“春秋无义战”？诸侯相互征伐，塞渠毁坝，无所不用其极。临国受灾，求之不得，更谈不上赈济就食。结果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齐桓公第一次会盟就提出“无曲防，无遏余”，反映出大一统集权专制的人民利益。[87] 可是盟来盟去，你来我往，毕竟各自为政的多，统一号令的少。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彻底废除分封，参照大禹治水定九州的格局实行郡县制，保证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才根本解决以临为壑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郭沫若踩活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一句，体现了老人家大处着眼的历史观。[88]

在小农经济分散经营、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的基础上，货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管理，集中调度的水利建设和跨地区救灾赈济，加上一个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洗劫，构成中国古代大一统集中管理的完整逻辑。在这个框架里，不仅封建分封不合时宜，而且地方势力膨胀，地主阶级兴起，都会对中央财政和各类储备，对统一动员调度的水利建设和边防战争，对全体居民的福祉发生负面干扰。需要强调指出，与西方（包括尼罗河与两河流域）的治水工程不同，气候、地形、土壤的高度复杂性重叠交叉在一起，中国水利建设具有持续进行的显著特性。譬如，黄河在解放前的两千年中，决口泛滥 1500 多次，大改道 26 次。[89] 治水与救灾、边防一样，从来就是不能间断的日常工作。因此，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和动员编户齐民，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出钱出力，治水救灾御敌；有知书达理的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不需要贵族僧侣夹在当中，恃强凌弱，盘剥百姓，奴役人民，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理想境界。

中国历史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响亮口号喊了几千年，妇幼皆知。[90] 中国的官制，从汉代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到唐朝的科举，最后发展成考试时糊名誉卷，入

仕后按期考核，推荐人连带奖惩，地方官任期规避等一整套防止徇私舞弊的严密制度，努力的方向是凭德才加官进爵，最大限度排除氏族门第的干扰。即便是皇权高高在上，也要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义制约。如果皇帝不仁不义，理论上就成为“一夫”——民贼独夫，人人可以得而诛之（西方不能想象的理论）。既然皇帝贵为天子，就要履行风调雨顺的职能。天旱不雨，蝗虫肆虐，地震台风，皇帝家里也得节衣缩食，真的假的下“罪己诏”，大作自我批评。

当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说说而已，历史上能举出几例？民贼独夫荒淫无耻的多了。理论上人人可以得而诛之，实践里却不容易得着。不杀得血流成河，换不下来一个坏皇帝。然而，就算是说一套作一套，就算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只要有这么一说，有这个牌坊在，当婊子就名不正言不顺，就挡不住人们按照这么一说去努力，去要求，去抗争。两相对照，欧洲封建主在妇女贞操神圣化的伦理基础上，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实行初夜权，简直就是不当婊子不好意思了。[91] 在这个意义上，与西方贵族奴役农奴的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观念和人权关怀，实在强过西方太多了。

刘邦一个不务正业的街痞子，朱元璋一个要饭的穷和尚，时来运转，可以开辟几百年的皇朝家业。卖狗肉的樊哙，放羊的卫青，杀猪的张飞，宦官后代曹操，当过农奴的石勒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的平民百姓，风云际会，都可以粉墨登场，演出一场场威武庄严的历史正剧。在等级森严的欧洲，到十字军东征打起仗来，上阵格斗还是贵族的特权。平民百姓只有扛行李递兵器打下手的份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完全无从谈起。至于正常年景，科举考场里“白衣取卿相”，在中国是家常便饭，在西方是根本没有途径。为了证明“东方专制主义”奇丑无比，平民很少机会当官，魏特夫根据正史列传，耐心统计平民出身的官僚：汉朝靠“举孝廉”选干部，不到8%；东晋讲究门第出身，9.5%；唐朝始兴科举，不到10%；宋朝和元朝均为15%；明朝为23%。古代没有普及义务教育，读书必须经济条件。而且，能上正史列传，载入史册者，当然多为皇亲国戚勋臣宿将。平民出身的比例竟有如此之高，就是今天西方民主社

会是否一定超过，都很值得怀疑。魏氏还找到一份 1256 年的科举进士名单，“有 50.3% 属于统治阶级”。上不了列传的一般致仕官僚，一半不属于统治阶级。

更有意思的是，进入官僚队伍，决不类似西方贵族分封，从此养尊处优，吃喝玩乐，还有初夜权代代相传。修齐治平，先忧后乐，民重君轻，一整套作人做事的道理，从来都是宦海沉浮的依据，罗织构陷攻讦倾轧的工具。魏特夫根据汉书列传发现，中国的人上人们“约 21% 曾经在不同时期因玩忽职守而被监禁，约有 35% 在战场上暴卒。12% 以上在监狱中受酷刑后被杀害或者死去，14% 被处决，9% 自杀”。1821-1895 年，几乎每一个高级官员都受过处罚。在呈报皇帝的案件里，22% 受到处决、流放、削职为奴、笞刑或监禁的严厉处分，42% 受到革职、降职、罚款等较轻的处罚。[92]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确保治水救灾御敌的宏观职能顺利进行，抑制打击豪强地主，是官僚机构的常规任务。李约瑟看到：“有魄力的皇帝对贵族家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就好象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激励一样。北魏和隋朝都给予在分裂时期（公元 4-6 世纪）声势显赫的豪强家族以致命的打击。唐朝曾多次大规模地没收佛教寺院的财产。在南宋灭亡前的 20 年里，政府从每户土地超过 100 亩的东部沿海地主手中，强行购买其土地的三分之一；由于买价极低，这种交易无异于没收；明朝的开国皇帝出身于农民，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没收富豪家族的财产，其中至少有 10 万人似乎已被杀掉。以后在 1397 年，户部尚书向皇帝呈交了一份全国现有的大地主名单，上面列有 14241 个名字都是占有 700 亩土地以上的人。……整个‘上层’或‘中产’阶级不可能是一个非常令人可怕的集团”。[93]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皇权专制与欧洲明显不同。虽然都是血缘继承，西方皇权是人间贵族，用来维护贵族奴役农奴的社会秩序，所以需要教会的支持。中国皇帝是天子，按韦伯的说法，与整个官僚机构一起，具有“卡理斯玛”的祭司性格，相当于原始社会的乞雨师，任务是保证风调雨顺。工作干得不好，理应改进；甚至以身殉祭，也在情理之中。这是中国皇帝，在制度安排上，被置于御史监督批评范围之内的原因。[94] 根据这种理解，法国重农学派

认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是自由而不是奴役的产物，它不是服从君主的个人意志，而只是体现了自然秩序的统治。换言之，君主作为专制主义的化身，他只是传达自然秩序法则的工具。他就好比乐队的指挥，每一个乐师必须服从他的手势，听从其指挥，决不容许有任何偏离和差错。这种乐队指挥的专制主义建立在对于乐谱的绝对服从上，无所谓暴政。” [95]

从食人生番式的原始社会，到罗马帝国的斗兽场，到中世纪的初夜权，到“羊吃人”的劳动力市场，欧洲阶级社会承认普通百姓追求人格完整的权力，走过一段逐步进化的漫长旅程。中国文化也有君子小人之分，却分在了个人修养的境界上。一个有教无类，一个因材施教，实现了理论上的人人平等。毛泽东讲话：“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96] 不分出身贵贱修身养性，追求人格完美，主流意识形态提倡了几千年。同样都是禁欲的宗教，等级森严地逐级修练，慧能以烧火僧身份直取主持的衣钵，登上中国禅宗六祖的宝座。这份洒脱，在西方教会，就是到今天，也难以想象。

决定上层建筑的是经济基础。欧洲土地分封，封建主不仅拥有土地，而且拥有人民。农奴终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不能合法离开，也不能攒钱买地自立门户。用马克思的话说：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 [97] 12世纪中，阿奎丹女公爵与英王亨利二世结婚，女方在法国南部的大片领地变成英国领地。一场婚姻下来，英国领地占法兰西领土的三分之二。 [98] 在中国，类似的情形，单从治水的角度就不能想象。小农经济分散家庭经营，流域治理集中统筹调度，全民动员，统一纳税服役，没有地方势力和贵族豪强尾大不掉，成为维持正常农业秩序的客观需要。“在中国历史上，从某种意义说，自耕农数量的增减，往往标志社会生产发展的迟速和经济的繁荣或衰落，也关系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寡”，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 [99] 所以，秦始皇下令“黔首自实其田”，从头开始，穷人、富人都是平等的“编户齐民”。“耕者有其田”，不仅是历代农民起义和近代革命党的口号，而且是历代政府重农抑商的理论目标。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中央强化统一集权，削弱地

方势力梗阻，打击豪强地主奴役百姓，清理吏治腐败，大张旗鼓经年累月宣传平等的意识形态。所以说，“理论上中国社会具有开放性的阶级结构”。[100] 一旦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日积月累到积重难返的程度：地主阶级坐大，土地兼并，把广大贫雇农向类似西方的农奴、奴隶转化 — 耕者有其田的希望彻底泯灭；官僚机构腐败，任人唯亲，把官爵职务向类似西方的贵族血缘世袭转化 — 德才兼备者入仕作官报国无门；社会稳定就无法继续了，人民革命势必发生，用狂风暴雨涤荡污泥浊水，重新澄清一个大致公平的社会秩序。动乱期间，群雄并起，能够胜利完成改朝换代的，总是那些有能力，在最大程度上，恢复政治清明和社会公平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环境里，西方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苏醒，中国简直一片光明。《马可波罗行记》被誉为“世界奇书”，奇就奇在流传出各种抄本、印本、译本、节本 143 种，以至于无法甄别究竟那个是原版。[101] 西方黑暗东方亮，中国的伦理、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工业、农业、医药、音乐、瓷器、茶叶、冶金、航海、治国思想，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掀起一场经久不衰的“欧洲中国化”浪潮：[102]

中国制造的火药成了他们对外发动战争的军火；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成了他们兵舰商船对外扩张的向导；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成了西方文化的传播媒介；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文官制度借鉴于中国的科举制，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也曾受到中国历史上御史制和文武百官制肘皇帝之传统的启发；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和 18 世纪的哲学家培尔、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蒙田、马勒伯郎士、伽桑狄、卢梭、孔多塞、笛卡尔等等多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的瓷器、茶叶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的古老历史及史书向《圣经》的世界历史纪年提出了直接挑战；中国的“开明政治”成了西方“理想政府”的模式；中国的重农风尚促使西方形成了以魁奈和杜尔哥为首的重农学派；中国古老的冶炼术成了西方最大金属工业的基础；中国式的花园庭院装点着西方的王府公园……[103]

直到 17-18 世纪，欧洲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热”席卷社会各个方面。路易十五发动中国瓷器取代银器的“日用品革命”，丝绸、陶瓷、漆器风靡欧洲，喝茶、摇扇子、打阳伞、养金鱼、长袍

马褂、轿子以及轿子演变的马车、园林建设，从宫廷推广到社会。满大街是崇拜中国的“中国舞场”、“中国咖啡室”、“中国浴室”、“中国影戏”等等。伏尔泰改编元曲《赵氏孤儿》，轰动一时，王公贵族家喻户晓，远超过今天好莱坞大片在中国。英国《世界杂志》慨叹：“现在的风气，一切都变成中国式或中国化了。椅、桌、炉橱、镜框，甚至最平常的用具，无一不受中国的影响。”

莱布尼茨说：“有必要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实践。” [104]

伏尔泰鼓吹欧洲全盘华化，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这个民族已有高度的文明了”。“在欧洲陷于迷信腐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行最有道德的纯粹宗教了”。“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我们不能象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 [105]

魁奈说：“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是已知的人口最稠密而又最繁荣的王国。”“胜过欧洲最文明的国家。” [106]

狄德罗说：中国人一旦发现道德居所有科学之首，“他们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有两只眼睛，我们只有一只眼睛，而全世界其余的人都是盲者了”。

霍尔巴赫说：“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务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所以“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107]

黑格尔说：“除却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中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没有贵族；唯有皇室诸子和公卿儿孙享有一种特权，但这个与其说是由于门阀，无宁谓地位的关系使然。其余则人人一律平等，而唯有才能胜任者得为行政官僚，因此国家公职皆由最有才智与学问的人充当。所以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便是我们也可以拿来作模范的。” [108]

（七）精神原子弹的物质基础

当欧洲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在西方人眼里，“人类智慧不能想象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109] 在中国人眼里，这不过是“大道既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小康社会，充其量只能算是“次优”选择。一篇脍炙人口的《礼运大同》，公私对仗，唱出中国人从“次优”小康到“最优”大同的千古追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110]

从莫尔的《乌托邦》到康柏内拉的《太阳城》，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合作社，到巴黎公社起义，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社会主义走过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探索过程。欧洲从黑暗中走出，一头栽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绞肉机，残酷剥削锻造出比中世纪更激烈的阶级斗争，汇拢成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耐人寻味的是，理论上，社会主义在西方从空想到科学；实践中，社会主义在东方从理论变现实。欧洲社会民主党信奉西方马克思主义，议会斗争，福利国家，走上既不想姓“资”也不想姓“社”的第三条道路。反倒是落后的东方，构造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回过头来，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冷战的两大阵营对垒。

两千年前的《礼运大同》，能否与康柏内拉的《太阳城》等量齐观，纳入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答案是否定的。乌托邦在实行初夜权的西方，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幻想，充其量，尝试过一些脱离主流社会的边远试验。中国文化、中国人民、中国士大夫，对天下为公大同境界的向往，与生俱来，几千年从未放弃。即便是在不

得不退而求其次的小康社会，从孔孟时代开始，修齐治平，民重君轻，先忧后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一类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思想，经历了整个社会几千年的实践奋斗，广泛、深入、持续地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苏武、班超、王昭君、蔡文姬、卫青、霍去病、诸葛亮、关羽、汉文帝、康熙、雍正、李白、杜甫、岳飞、韩世忠、辛去疾、陆游、花木兰、梁红玉、宋江、李逵、包拯、海瑞、文天祥、史可法、李自成、牛金星、顾炎武、曾国藩、左宗堂、陈天华、秋瑾、鲁迅……文的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朝的在野的，当官的造反的，干成事的没干成事的，无数英雄，时代不同，地位不同，挑战不同，阵营不同，理论表述不同，但作人的情操，做事的准则，向往追求的理想境界，为人处世一以贯之，始终如一。

中国没有宗教，宗教就是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理想追求。令西方早期学者最吃惊的是，这样崇高的道德理想，在奴隶制、农奴制的西方，现世里看不到对应的踪迹，只能归属宗教天国；在中国，化解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浅显道理，始终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无法区分哪些是宗教，哪些是现实。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开始，从来就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人生奋斗的努力目标。换句话说，雷锋在西方只能进修道院；在中国却可以成为政府号召普通百姓学习的榜样。[111]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文化不可战胜，甚至外族统治几百年，反而逃脱不了被同化的命运。孟德斯鸠发现：“在那里，习惯、风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个东西。人们不能够一下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改变了。改变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变，就是被征服者改变。不过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风俗并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逐渐地被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112] 这恐怕是中国文化最有力量的表现。

中国文化的伟大力量，继续体现在两百年来民族振兴的道路探索上。西方列强的凌辱，揍醒了东方睡狮。西学东渐激发的革新奋进，促成传统理想的复古追求。过去，中国百姓盼清官、盼好皇帝，是因为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没什么不好，只要能认真遵照执行，就谢天谢地了。如今，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出来一个彻底

变革制度的决心：小康社会的礼教制度，无法防止惟我独尊的皇帝荒淫无耻，无法根除贪官污吏徇私舞弊。非实现大同，不能一劳永逸。在奴役奴隶农奴的西方社会，社会主义属于来世空想的乌托邦；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是社会进步顺理成章更上一层楼。只要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能进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境界。推己及人，唾手可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从“次优”小康到“最优”大同的千年追求相结合，凝聚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创造并且仍在继续创造一系列西方理性经济人不可理喻的奇迹：

奇迹一：大鼻子基督教来中国相亲，“天父天兄”被拥戴成群众造反的神圣，居然不负众望，放下身段，频频下凡显灵，把传统的农民起义，升华成有史以来意识形态最鲜明、政治理想和制度诉求最完备的太平天国运动。西方宗教里的天国，来中国实践人间乐土。禁烟酒嫖赌，男女别营，取消家庭，取消私有财产，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倡导“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一呼百应，所向披靡。[113]

奇迹二：中国王朝洗心革面现代化，“戊戌变法”照着西洋、东洋的模子改弦更张。转轨的理论基础是康有为的三部曲——《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猛烈抨击西方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大声疾呼“去人之私产”，“举天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归公政府商部统之”。

“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取消阶级、国界、家庭。[114] 整个一个《共产党宣言》。

奇迹三：被海峡两岸奉为国父的孙中山，代表新生资产阶级提出的革命纲领，居然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首先反对的是“许多人把土地当作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孙文主张“大资本尽为公有”，“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

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保证纲领实现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联手革命的竟然都是资产阶级的死敌。两岸国父反复强调：“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115]

奇迹四：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揭篥西方大机器生产的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从最落后的边远地方割据开始，经过 28 年武装斗争，依靠没用过电灯的农民，用缴获武装自己，居然打败西方先进生产力全力扶持的蒋家王朝，一举推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三座大山。

奇迹五：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近代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共产党从亡国灭种的边缘一路打起来，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接着就抗美援朝，接着又抗美援朝，用绝对劣势的装备，与先进生产力最发达的美国正面作战，居然两次打破美帝国主义的不败纪录。

奇迹六：“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农业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三年困难时期”，饿殍遍野以千万计，老百姓居然不偷不抢不反。鞠躬道歉之后，红色政权坚如磐石，稳如泰山。

奇迹七：刚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惨重挫折，居然能够在同一方向上继续革命，成功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日三省身”演化成“早请示晚汇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斗私批修“思无邪”。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企业，所有部门机构团体企事业单位，造反派斗争夺权，你来我往，文攻武斗，持续动乱十年之久，共产党政权巍然屹立。

奇迹八：就在这一浪高过一浪政治运动中，过去连一辆汽车也不能生产的中国，在短短 30 年不到的时间里，一边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反击战、抗美援朝战争、与苏联全面对抗备战；一边居然建成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自力更生造出“两弹一星”。巨大的经济成就令人震惊。 [116]

奇迹九：改革开放以来，东欧倒戈，苏联解体，几乎所有转轨国家共产党下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目前虽然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犯罪飙升，信仰危机，几千万上亿民工四处流动了20年，居然硬挺着红旗不倒，稳定压倒一切，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社会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与黄仁宇相比，李约瑟是旁观者清：让中国模仿西方，“历史已证明这是完全荒谬的。……重新调整内部的结构远远比模仿外部世界更容易找到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远远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更能与中国的过去相一致，因而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117] 欧洲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进化，是通过蛮族入侵实现的。史学主流却从来没有把摧毁罗马文明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相反，众口一词谴责“黑暗时代”的倒退和停滞。[118] 事实上，烧死伽里略的“黑暗时代”，阻挠历史前进，到底还是靠复兴奴隶制时代的文艺颠覆的。拿这个逻辑过程，对照中国现代的社会进步，蒋介石抛弃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治纲领和三大政策，希图借助洋人势力，硬塞进一段西化、美化的原始积累和两极分化，等于要把中国推入另一个野蛮停滞的“黑暗时代”，焉有不败之理？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极端的经验教训，均超出西方理性的正常想象。列强们在中国“利益均沾”的时候，以为碰到的是另一个玛雅王朝呢。谁能预料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了韩战打越战，和苏联翻了脸，竟自己搞出“两弹一星”来？——其实想想汉武帝驱匈奴，想想四大发明从哪里来，就不奇怪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大惑不解，放真卫星的苏联还不敢吃饭不要钱呢。——其实想想东汉张鲁在汉中吃饭不要钱几十年，想想中国农村的义仓族产持续存在几千年，就不难理解了。中国文化从“大道既隐”的“次优”到“大道之行”的“最优”，天下为公的慧根代代相传几千年。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与不可战胜的伟大文化并存，一旦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醍醐灌顶，精神原子弹裂变，无穷能量释放出来，正反两个方面，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经久不衰，红旗不倒，产生和积累了理论发展的丰富内容。

（九）中西医结合的历史使命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容纳得下中国发达的生产力，却容不下“黑暗时代”醒来的欧洲？西方全面学习东方先进的一切，同时发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创造出大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新文明。

[119] 哲学上的一般抽象，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资本主义是东西方文化杂交出来的新物种，以欧洲为母体，沿着罗马角斗场、贵族初夜权的轨迹进步，东西方文化结合产生的资本主义，属于西欧历史系列的社会形态。

接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征服屠杀掠夺，把东学西渐逆转成西学东渐，带来新一轮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结合。东学西渐，输出四大发明；西学东渐，引进大机器生产。送出去的是老子、孔子；请回来的是“德先生”、“赛先生”。中国的科技和科举输出西方，变成船坚炮利和三权分立，变本加利，“出口转内销”了回来。东学西渐的时候，“中国热”席卷欧洲，虽然有伏尔泰鼓吹“全盘华化”，欧洲到底没有转轨、接轨成“东方专制主义”。同样道理，西学东渐发生西化美化崇洋媚外，同时引进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俄国借着原始村社公有制的产权不清，全面推动农业集体化，支持工业化，骤然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120] 接着，

“东亚病夫”抖擞精神，焕发出建设大同社会的千古热情，打了韩战打越战，自力更生造出“两弹一星”。苏联解体之后，在全球一体化的新世纪，被美帝选成独霸世界的竞争对手。

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亚洲几小龙、几小虎脱颖而出，同样具有丰富的理论启发意义。50年代初期，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直接指挥下，按照美国的方案，实施全面体制改革。日本是被占领的战犯，没有参与改革方案国际研讨会的权力。如果讲转轨、接轨，而且是从东洋资本主义到西洋资本主义，应当没有比日本“道奇改革”更彻底西化、美化的了。日本人点头哈腰，认识执行美帝指令，改革成果却让西方哭笑不得。譬如，财阀与政府沆瀣一气，发动侵略战争。彻底解散财阀，政治上防范军国主义复兴，经济上实现平等竞争。不曾想，实行的结果是大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甲企业属于乙企业，乙企业属于丙企业，丙企业属于甲企业；一家企业持十家股份，十家企业持一家企业，弄成了私有制社会里

臭名昭著的产权不清，“资本和经营的彻底分离”。即便有股票市场，股东几乎没有关心资产的权力，得到的只是发达国家最低的分红率，而且通常是固定的。对应的是极高比例的企业积累，员工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工序列制，上下同欲的“团队精神”和勇于拼搏的“扩大事业主义”经营。东京、大阪等工业城市里，许多通讯地址名称直接是“某某企业职工宿舍第几区、第几片”，至今也没有转规“商品化”，企业办社会还在继续。譬如，在农村，一个全国联网的农协，把农产品的产供销组成一条龙的封闭垄断系统。土地兼并严格控制，小农家庭保护经营。譬如，特殊的优惠和立法，使农村金融金库垄断了整个农村金融市场，城市商业银行根本下不了乡。进出口贸易银行、国家发展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等等，一个银行一个法，一套存贷款和利率管理条例。结果，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任何宏观调节，势必产生千差万别的地区效果和行业效果。政府不得不“窗口指导”耳提面命。被一部银行法管所有银行的美国人，称为“变态金融”。譬如，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民主选举，结果是党内有派的一党专政稳定持续……

正是“道奇改革”之后，借着韩战、越战，日本通过“官商经济一体化”的产业政策和组织，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21]接着，“四小龙”紧随其后，在台湾“平均地权”的土改中，农复会几乎就是日本农协的翻版。被世界银行津津乐道的进出口自由化，经济骨架是中钢等国有大企业和整个金融系统国营。[122]南韩大企业的私有产权比日本来得清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却比《股份公司日本》更直接、更密切。[123]李光耀亲自经营管理新加坡，事无巨细，无微不至。[124]香港与新加坡一样，没有钢铁，没有汽车，用不着关税保护，也用不着政府干预的产业政策，经济学教科书奉为自由市场的典范明珠。作为一个港口城市，香港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是土地。土地在香港，连私有制都没有。

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和小龙小虎们被索罗斯的美元冲击得头昏目眩，七葷八素，一蹶不振。从西方发来一道“裙带资本主义”的商标，东洋日本与东亚龙虎们个个需要回炉，与东欧苏联中国一道，重新投入转轨、接轨的改革开放。有过美国军人亲自领导、直接指挥的“道奇改革”，反复回炉的结果，繁衍出更多、更高层次

的变异，应当不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日本和亚洲龙虎们，属于儒家文化的边缘。边缘尚且具备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创新变异，凝聚发挥巨大威力，诺大中国如果真的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通了，美国选中国当竞争对手，早晚悔不当初。

历史的客观进程是清楚的。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西方社会进化的途径，一步一个脚印，无法超越，不能迂回。中国与欧洲是两股道上跑的不同的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重演西方的历史。迷茫的是思想学术界。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不可抗拒，转轨、接轨的热浪前推后涌，“西方热”、“美国热”，热锅上蚂蚁，心浮气燥，火烧火燎。就象讨论中西医结合，这时候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西医一体化，中医再表白，在西医主导的科学范围，一时半会儿，不容易说得囫圇：金木水火土对着肺肝肾心脾，肾为“命门”，心主思想。东西南北中（五方），寒暑燥湿风（五气），青赤黄白黑（五色），酸苦甘辛咸（五味），生长化收藏，加上阴阳虚实，相生相克，相克还相生。看起来病来，望、闻、问、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个经络一股气，看不见摸不着，却哪里都有。真的是有就是无，无才是无处不在之有哩。按照西方实证医学科学，解剖没有的就是没有。所以，西医看病和技师修车，是一模一样的规矩——根据症状找到毛病，哪里坏了修哪儿，哪个零件坏了换哪个。思想、情绪解剖不出来，西方就有歧视乃至迫害精神病的长期历史。表面上看，西学东渐，中医争论不过西医。实际上，正是随着西医医院、学院的遍地开花，才有了中医医院、学院的雨后春笋。中药和中药保健品的工厂化生产也乘势而起。和中国没有宗教的道理一样，中医始终融化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知道上火不要吃狗肉——狗肉性燥；拉稀不宜吃黄瓜——黄瓜属凉；有金创不能吃海鲜——海鲜会发；……虽然说不出“上火”的“火”在哪里，能当打火机点烟吗？虽然不能用解剖学的语言定义“燥”和“凉”，虽然很难解释“发”的程度如何度量，吃螃蟹（凉）得蘸生姜末（热），中医永远活在中国人的每一道菜里。中国人均收入低，人均寿命早早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便宜的中草药，不花钱的气功针灸拔罐按摩，一日三餐饮食男女的养生之道。

西医中医，只要无法相互替代，你是我非的争论，势必持续进行下去。更深层问题是，争论研讨，学术上最终寻求的是什么结果？直接拿中医驾御西医？可能性看不清楚。用西医解释中医，用西医曾经有过的几个发展阶段套中医，用解剖学的科学手段寻找经络，发现气穴，缘木求鱼，徒劳无功的可能性居多。根据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真正打破僵局的出路在于，既不盲目崇拜西医，也不胡乱贬低中医，而是投身实践探索，解决实际问题，针对疑难杂症治病救人，在中医的土壤引进西医的理论技术，从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中，逐步提出和建立新的规范，“从而产生出一种不一定限定为现代西医的、真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医学科学。” [125] 在这种信念指导下“摸着石头过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倘若真的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融会贯通，那是什么？——人类医学新纪元。

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学术意义。

（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形象地类比，正是中西医结合，创造人类医学新纪元的历史。中国历史，没有少数欧洲国家那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过程，不需要也不可能亦步亦趋重复西方的历史。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使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穷途末路。帝国主义大机器工业文明的引进，组合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变成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国家沦落到亡国灭种的境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军阀混战、蒋家王朝四大家族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使积弱垂危的古国焕发新的青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无庸讳言，在中国重新崛起的探索进程中，有过重大失误，付出过巨大代价。为此，才又有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引进市场机制。需要注意的是，纠正错误，弥补损失，不等于全盘否定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新找回三座大山，把中国重新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转轨的彼岸需要探讨，彼岸的方向却是确定的。

只要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两段历史无法否定，就不存在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照搬西方，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问题。转轨的探索，就应当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迹继续前进。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加日本和俄罗斯人口的总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大陆、港澳、台湾和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已经在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切不可妄自菲薄，在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中，动摇乃至迷失“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26]

值得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不受西方历史进化公式的束缚，对东方国家超越式的社会革命和社会进步，充满信心和希望：“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在太平天国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革命满怀热切期待：“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象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的欧洲反动份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127]

中国的历史与欧洲不同，中国社会主义当然与欧洲社会主义不同。二战以后，东方国家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并不影响东西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特点，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继续探索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多次把中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极限，并由此，把中国革命说成是“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人类医学新纪元。同样的逻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功，中华民族的全面

振兴，将为人类，培育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明。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舍身忘死，上下求索的真谛。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几亿、十几亿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们距离光辉的彼岸越来越近。

[1] 文中楷体，包括引文中的楷体，除单独成段的引文外，均为作者的“加重”描述。

[2] 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 2000，第 388 页。

[3] 如今，俄罗斯的 GNP 仅为中国大陆的三分之一。1991-1997 年，俄罗斯的 GDP 下降了 83%。资产价值不低于 2000 亿美元的 500 家大企业，以 3% 的低价私有化。1991-1996 年，流出资金 3000 亿美元（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三联书店 2000，第 42 页）。1997 年，60 家金融工业集团垄断 50% 的工业产值，控制 70% 的银行资产（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第 17 页）。

[4] 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第 411-418 页。

[5] 全名为《改革经济通讯：转轨》（*Newsletter about Reforming Economies: Transition*）。先由世界银行主办，后变成世界银行与 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合办。免费赠阅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索罗斯通过匈牙利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赞助。

[6]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第 404 页。

[7] 《李约瑟研究》第 1 辑对这些讨论给出一个典型的综合（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0）。令人不解的是，专门摧残技术进步的旧体制、旧文化，为什么老早产生那么多实用的发明创造？西方体制、文化那么有利于科技进步，为什么要从中国引进四大发明？

[8] 其实顾准写得明白，支撑希腊城邦民主的物质基础，是杀戮征服的海外殖民和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连享受公民权的贵族，借钱还不上，也会变成奴隶。希腊城邦极盛期，规定雅典公民只能有五千人（《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林中泽论证，在雅典全盛期，奴隶占雅典人口的 30%，海外殖民地的“外邦人”占 10%，能够享受公民待遇的，最多不超过人口的 1/12（《早期西方文明史札记》，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第 31-32 页）。为什么享受民主的公民数量如此之少？因为公民们根本不劳动，只管打仗征服和体育训练，连经商都是奴隶干的事情（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 1974，第 249 页）。

[9] 西方拿去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雨伞、陶瓷、丝绸等等诸多文明演化的关键发明，不仅没有掏钱购买“知识产权”，而且做成坚船利炮，装上鸦片打回来。今天微软凭什么理直气壮到中国打官司？微软的计算机，从阿拉伯拿去阿拉伯数字，从《易经》拿去二进制，不是也没付过知识产权吗？如果把这些知识产权，按利滚利的年代算一笔帐，整个微软全部赔过来还不够呢。

[10] Charles Singer、E. J. Holmyard、A. R. Hall 和 Trevor I. Williams 编：
《A history of technology》第 2 卷，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7，第 753-776 页。

[11] 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区别欧洲社会进化的历史。概念涉及的地域，包括中国和印度，中东国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拉伯和土耳其，中亚国家鞑靼，以及远东国家爪哇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阿兹台克时期的墨西哥和印加时代的秘鲁。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是“半亚细亚”国家。“在谈到伊斯特刺斯坎人和摩尔时期的西班牙时，马克思也用了‘亚细亚’这个词”（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 1981，第 88 页）。面对如此广大的地理范围，西欧少数国家社会进化的历史，不仅够不上一般规律，反倒成为偏居一隅的特殊个例（王小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启示”，《农村·经济·社会》第 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1，第 347-356 页）。

[12] 冯承钧翻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第 359 页。

[13] 1964 年，李约瑟在“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说：“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

（Raymond Dawson 编辑：《The legacy of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0，第 237 页）。李约瑟浩瀚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表明，当时欧洲从中国的技术引进，具有全方位的特点，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而且包括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送带和传递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包括水上航行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尾舵等技术，包括天文学、宇宙学、解剖学、免疫学、药学等领域（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14] 甲骨文共出土 4500 余字，能够辩识的 1700 余字（《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第 4753 页）。郭沫若著《奴隶制时代》，开宗明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封建制，和马克思主义所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这已经成为一般常识。40 年前，托派所叫嚷的中国社会空白了奴隶制，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上建立起封建社会的谬论，早已吹送到九霄云外去了”（人民出版社 1973，第 1 页）。国际上关于中国是否有过奴隶社会的讨论，始终没有结束。外国学者估计，中国蓄奴最盛的两汉，奴隶占人口的比例不到 1.5%；而希腊雅典时代，奴隶数量达到人口的 35%（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 210 页）。

[15] 秦始皇统一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分封贵族的封建制度，周以后就不再是国家制度的框架基础。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属于“青

铜时代”，到公元前 220 年就结束了（《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第 56 页）。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付筑夫反复论证：“假定战国时期没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则许多重大历史变化将成为不可理解”（《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人民出版社 1988，第 216 页）。中国长期停滞的命题，据说最早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最近遭到《白银资本》们的强烈抨击。总而言之，吴大琨的抱怨一语中的：“把一个明明不是和西欧社会走同样发展道路的中国社会，硬要用和西欧社会同样的分期名称来分期，这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本前言，第 5 页）。

[16] 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中国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弗兰克通过大量史料证明，到欧洲资本主义初期，“中国最强，欧洲最弱，日本和印度介于二者之间”（《白银资本》第 375、266 页）。

[17] 王钺、李兰军、张稳刚：《亚欧大陆交流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0。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0 页。

[19] 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第 51、60 页。

[20] 晚年马克思、恩格斯敏感地预见到可能的俄国革命，给予高度关注。关于革命的性质，恩格斯在反驳俄国特卡乔夫时，谨慎地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够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10 页）。1874 年，特卡乔夫在“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中提出：“如果我们没有城市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我们的工人只需要同政治当局作斗争”。列宁认为，俄国落后的工业和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构成革命的有利因素。别尔佳耶夫因此指责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是以马克思的名义进行革命，而不是以马克思的精神进行革命”（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 230 页）。列宁同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的分歧，斯大林同布哈林的分歧，后来毛泽东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的分歧，以及今天转轨进程中的诸多分歧，背后都有同一个深层理论背景——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该不该、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

[21] 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刘国石：《宋明帝刘炬传》，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第 1 页）。

[22]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 1985。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49 页。

[24]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刷馆 1996，第 11-15、71 页。

[25] 《史记·货殖列传》。

[26] 整个欧洲 1005 万平方公里。八世纪末，查理帝国统一西欧，虚弱松散，与当时并存的唐朝无法同日而语。如果按统一欧洲说事，欧洲 2000 年才刚刚有了欧元。相当面积的统一国家，车同轨、书同文，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27] 从公元前 2 世纪到 20 世纪 40 年代，2140 年中，历史记载自然灾害 5145 起。其中秦汉 340 年 375 次，三国、两晋 200 年 304 次，隋 29 年 22 次，唐 289 年 493 次，五代 54 年 51 次，两宋 487 年 874 次，明 276 年 1011 次，清 296 年 1121 次，民国 26 年 77 次。没有记载的局部小灾更是不计其数（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 1958，第 7-44 页）。

[28] 中国耕作技术的复杂，通常的解释是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追求高产。深翻在欧洲是 10-11 世纪开始的事情，中国早熟在春秋之前。当时尚有大片南方土地没有开发，高产显然并非唯一追求。适应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应当给以充分考虑。中国一年四季旱灾有春旱、夏旱（掐脖旱）、秋旱；水灾北方有洪水，南方有梅雨；低温有寒潮、春霜、秋霜；风灾北方有干热风，南方有台风；再加冰雹、地震，一年四季，各种自然灾害防不胜防（《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 1980，第 28-37 页）。

[29] 中国传统农业地区，与 400 毫米降雨线基本重叠的明长城以内，均属典型的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降雨集中，灾害频繁，作物种类和耕作制度复杂，适合小农经济。只有新疆平原和东北平原，气候稳定，地势平坦，适合单一作物大面积种植的大农业。

[30] 只有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路面上不安全，商品交换全面萎缩，民间出现坞堡庄园，自给自足，在战乱中以求自保。就在这段全面恢复自然经济物物交换的时代，中国还出了鲁褒强烈抨击货币拜物教的《钱神论》哩。

[31] 《汉书·食货志》。

[32] 《孟子·滕文公上》。

[33] 韦伯看到中国“铜依然是日常交易的通货。西方贵金属的广大流通量，是史家所熟知的，尤其是汉朝的史家。”但是却正题反用，一口咬定：“由于农业生产重于一，是以货币经济直到近代几乎都比不上埃及托勒密王朝时的发展程度”（《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教》第一章第一节，台湾远流出版社 1989）。埃及给托勒密修金字塔的广大奴隶，哪位富裕得可以用金币从事商品交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至于斯。

[34] 《汉书·食货志》。中国古代茶叶、绸缎、漆器、瓷器出口到西方。早期西方丝绸与黄金同价，茶叶、瓷器只有贵族能够享受。进口多为香药、犀象、

珊瑚、琥珀、玛瑙等与百姓无关的奢侈品。所以，中国古代一再有闭关锁国的海禁。乾隆皇帝一段“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名言，居然被后人作为因噎废食故步自封的铁证，反复引用。

[35] “中国的货币，自古即以铜钱为主，而且自秦汉以来，就普及到民间去了”。就是到了近代，1912年调查，“大小铜元铸行之数已达290余万万”。另有占货币数量25%的钞票，大量流通的银元、金银和外国货币。货币数量之大，人均占有货币数量之多，就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早期，西方社会也望尘莫及（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下册，群联出版社1954，第493、547-55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9页。

[37] 江南市镇形成网络，平均相距15公里，各乡农民往返时间相当（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第26-36页）。

[38] <http://www.gzic.gov.cn/>

[39]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册，第5页。容易理解，纸币的采用，取决于信用和印刷术两个方面的发展。

[40] 冯承钧翻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

[41]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其所受通货贬值和通货膨胀的祸害，有中国人这样多而深的。中国自汉以来，物价涨到万倍的至少有五六次；金人治下涨到六千万倍以上，其他百倍十倍以内的上涨，次数更多”（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册，第14页）。

[42] 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金银”。马克思论述货币的起源，也是从金银的特殊属性开始的（《资本论》第1卷，第106-108页）。西方在使用金银币交易的同时，也有更小单位的铜币，却从来不是主要流通货币。譬如，法国古代大封建主都有权铸币。13世纪末期，法国国王命令停止封建主铸金币和银币，可以继续铸铜币。说明当时铜币的流通范围有限，作用不大（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9-50页）。两相比较，中国历史上，除了王莽币制改革的一段很短时间，从来没有正式铸金币，说明金的日常流通作用远远比不上铜钱。由于铜币广泛流通，汉武帝以后就全面禁止民间私铸。中国人在汉代已经充分了解货币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贾山反对汉文帝废除盗铸钱令时指出：“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权柄也，令民为之，是与民共操柄，不可长也”（《汉书·贾山传》）。直到近代西方银元进口，套购白银出口，才迫使清政府铸银币（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第44页）。

[43] 《史记·货殖列传》。

[44] 历史上“食货者，生民之本也”、“农商为国之根本，民之命脉也”、“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等等农商为本的学术讨论，史不绝书（吴松等：《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45] 西方经济史大家——熊彼特对此感慨不已：这是“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货币管理与兑换管制的办法，这似乎先得有相当的分析才行。由一再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现象，无疑曾经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经济分析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91，第 86 页）。

[46] 美国人卜凯 1921-1925 年的调查，平均每个农民收入的 58% 属于现金收入。中部和南方农民的现金收入比例高达 66%！（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第 154 页）

[47] 《战国策·齐策》。

[48] 公元前 2 世纪，咸阳就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到 6 世纪，南京人口超过百万。到 18 世纪，洛阳、西安、开封、杭州和北京，人口都超过百万。到此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出现过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直到 1810 年左右，伦敦才成为中国以外的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比南京晚了 1500 年（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第 262 页）。

[49] 1290 年，英国颁布“买地法”。但是，土地买卖始终是贵族骑士和教会巨商之间的事情（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5）。

[50] 王充《论衡·率性篇》。西方庄园的土地经营是大面积粗放轮作。种地时分成条块地，各家农奴分头劳作；收获后界限全无，自由放牧。土地归领主所有，既不深翻，也不施肥（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

[51] “商人兼并农人”成为一般历史现象。汉代极端的说法是，“扈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 349 页）。

[52] 《史记·货殖列传》。

[53] 有说法是经商和贷款的投资报酬率 10-20%，乃至 30% 以上，吃地租的土地买卖投资报酬率为 5% 或 5-10%（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第 156-157 页；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121-122 页）。总之是吃地租远远比不上“依市门”。

[54] 20 世纪 30 年代，不在当地的“不在地主”拥有所有出租土地的四分之三。19 世纪末，华北调查 131 户地主，94% 是商人和高利贷者。20 世纪，安徽

芜湖调查 36 户地主，23 户是商人，只有两户从事农业。广东调查 191 户地主，73% 是商人（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118 页）。

[55]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 93-95 页。这方面的记载很多。譬如，近代民国，北方山西五省 81 县一次受灾，地价较灾前平均下跌 37%，皖北诸县竟跌至半价（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三联出版社 1957，第 724 页）。

[56]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129 页。

[57] 胡如雷用大量资料证明，由于粗放经营，“佃农的实际耕种面积一般都较自耕农为多”（《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 318 页）。

[58] 胡如雷以唐朝均田制破坏将中国古代土地兼并分成前、后两期。后期全国土地基本开发完毕。宋朝开始，民分主户、客户，佃农和地主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从杨炎的“两税法”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已经是对地主经济的完全肯定。

[59] 清人钱泳说：“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 50-100 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 50 年，竟亦长至 50 余两矣”（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 95 页）。根据梁方仲的数据，1721-1766 年（康熙 60 年到乾隆 31 年），中国人口从 2562 万增加到 20809 万，增长八倍（《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第 10 页）。

[60] 地租占当年收入的比例，明末清初为 43-80%，顺治 15 年为 50%（地租为陈振汉资料，地价为李文治资料。见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7，第 115、93 页）。

[61] “地租购买年”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给出地价通过地租的回收周期。假定地租率（地租占当年收入的比例）有极限；假定在地租率达到极限之前，地租购买年、利率和商业利润率是可比的；地租率达到极限之后的地价上涨，逻辑上可视为泡沫。

[62] 明朝“俗语云：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十年之间，已易数主”（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 49 页）。辛去疾《最高楼》也有“千年田换八百主”之句。一方面说明文学描述不能当作统计数据；一方面更说明，土地买卖频繁，宋代亦然。

[63]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第 155 页。

[64] 抑制土地兼并是官僚机构的重要职能。吏治腐败，水利失修，救灾赈济中饱私囊，盗匪蜂起，战祸连年，都使撩荒和流民大量产生。1935年农业实验研究所调查1001县，“农民离乡总数当年至少在2000万以上”（《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第59页）。

[65] 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346页。

[66] 付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第179页。

[67] 大陆共产党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土改，分配了大约占全部耕地面积43%的土地。中国佃农占农户的比例，宋朝为34%。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维持这个“通行的百分数”（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13、126页）。

[68] 17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销往中国的出口商品，仅相当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2%，50年代不超过5%，60年代才达到10%（王钺等：《亚欧大陆交流史》第289-290页）。“众所周知，只是由于英国人诉诸在印度专门为他们生产的鸦片，才在19世纪最终扭转了这种形势”（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68页）。

[69] 汉书的典型说法是：“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汉书·食货志》）。

[7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9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67页。

[71] 王符写道：“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提出要抑的是“披采众利”的“游农”、“巧伪饰之”的“奸工”和经营“无用之货，淫侈之币”的“淫商”（《潜夫论·务本》）。

[72] 吉登斯：《第三条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第166页。

[73] 张海涛：“再论美国‘赌博资本主义’”，《香港传真》No. 2001-14。

[74] 说赌博与犯罪相联系，究竟是禁赌的原因还是结果，逻辑上是因噎废食。从没听说因为有人抢劫就不办银行的道理。世界各国在帮助残疾人、开发沙漠等最没人愿意投资的地方，用博彩筹措巨额资金，说明赌博集聚资本的特殊有效性。但是，究竟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提倡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没有给出任何理论回答（戈春源：《赌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李交发：《治赌史鉴》，岳麓出版社1997；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鲁言：《香港赌博史》，广角镜出版社1978）。

[75] 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第 218 页。

[76] 《孟子·滕文公上》。

[77] 士大夫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上要求“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商人唯利是图，发财致富的结果是“先天下乐而乐，后天下忧而忧”。农、工居中，天下忧时不得不忧，天下乐了才能跟着乐。农比工，在程度上，更先忧后乐一筹。

[78] 均转引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 223 页。

[79]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第 297-298 页。

[80]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4。

[81] 林中泽：《早期西方文明史札记》，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第 12-13 章。韦伯也说：“清教的性禁欲主义与僧侣生活的性禁欲主义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基本原则上的差别……因为性交（即使结婚以后）只有作为遵从上帝‘多生多善’的训诫去增加上帝荣耀的手段才能允许”（《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第 147 页）。

[82] 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 111 页。

[83] 《费加洛的婚礼》先是话剧，1778 年上演，引起轩然大波，在法国、德国、奥地利被禁演。1784 年在法国首先开禁。1786 年莫扎特的歌剧上演（《费加洛的婚姻》，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 1999）。西方极乐世界，充满是民主人权。有谁愿意记起，莫扎特的美妙音乐，歌颂的是反抗初夜权的胜利；洁白的婚纱，象征纯洁的新娘不再被贵族蹂躏？

[84] 后来有法律规定，农奴流亡到城市半年时间以上，封建主未能及时找回，人身依附关系合法结束。更多的地方需要农民出钱来赎买自由人的身份。真正的彻底解放，靠得是遍布欧洲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

[85] 《尚书·禹贡》；尹世积：《禹贡集解》，商务印书馆 1957。

[86] 赈济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缓解富商大贾趁灾情地价猛跌而土地兼并。譬如，康熙 36 年汾阳受灾，“赈所不及者持田契求售，踵接于门，皆自贬损价值”（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 94 页）。

[87] 《孟子·告子下》。

[88] 毛泽东才真正是令人钦佩的“大历史”眼光呢（薛泽石主编：《跟毛泽东学史》，红旗出版社 2000，第 230 页）。

[89] “淮河流域在解放前 500 多年中发生较大水灾 350 次。海河流域在 1369-1948 年 581 年中发生水涝灾害 383 次”（《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第 31 页）。

[90] 历史上虽然很少王子伏法的实例。但是，在这个理想口号的大帽子下，小民告倒大户的例子比比皆是。譬如，一场没完没了的包公戏，整个说的都是抑强扶弱，除暴安良。譬如，杨乃武与小白菜一场官司，牵扯出江南上百官员因为官官相护受处分。当然，民告官，先得跪钉板；不属实，要罪加一等，等等。但是，理论上，中国的“官”不是贵族，而是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的斯文学者。先有修身养性的自我约束，后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优待。这里的“民”，包括穷困劳动人民和富商巨贾。只要没有修身养性的功名身份，再有钱，穷民、富民在法律上没有特殊优待。富人送子读书，拿钱买功名，以及用钱腐化官，是这种制度必然派生的产物。西方封建主天经地义奴役农奴，找不到类似的故事，根本没有人民对清官的期盼。从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这样追求平等的制度设计出发点。

[91] 在这个意义上讲刻薄话，如今每每有人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不仅恬不知耻，而且大义凛然，真有些“不当婊子不好意思”的意思哩。譬如，有人堂而皇之写文章，为《白毛女》里的黄世仁翻案，为《高玉宝》里的周扒皮翻案（马荃伯：“从为黄世仁周扒皮翻案想到的”，《香港传真》No. 2001-12）。譬如，有文章一本正经地指出，中国加入WTO，讨价还价全属多余。对外开放根本不用对等。取消关税是对走私釜底抽薪（薛兆丰：“消灭走私的绝招”，《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1月15日，第22版）。譬如，雅科夫列夫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党内二把手。1997年接受《消息报》采访。记者问：“您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有最高的职务，您怎样把自己的职务和反共观点结合在一起？”答曰：“我对共产主义失望了，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危害，最僵硬，应该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有两条道路。一种是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去反对。第二条道路是从内部摧毁它。我发现，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站在反共的立场，但是要从内部来反对”（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第144页）。简直就是炫耀当婊子的光荣了。

[92]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第 363-369、353 页。

[93] 《李约瑟文集》第 288 页。

[94] 《中国的宗教：佛教与道教》第 94-95 页。关于帝王的责任，孟子认为，人主对年成的好坏，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岁罪，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

[95]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第 239 页。所以，伏尔泰赞而誉之：“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人们在皇帝面前必须象敬拜神明一样下跪，对他稍有不敬就要以冒犯天颜之罪受到惩处，所有这些，

当然不能说明这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独裁政府是这样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风俗论》下册，商务印书馆 2000，第 509-510 页）。关于中国皇帝饱受官僚体制揉搓的学术研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可为经典（三联出版社 1997）。

[96] 《毛泽东选举》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第 660 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71 页。

[98] 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 334 页。

[99] 中央政府与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明朝王夫之概括得极其清楚：“言三代以下之弊症，类曰豪强兼并，赁民以耕而役之，国取什一而豪强取什五”（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 127、349 页）。

[100] 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 197 页。中央政府与地主阶级以及地方割据势力，在经济政治上，经常处于斗争状态。“官僚机构的官员们并未形成一个世袭集团。因此，按照‘阶级’这个词用于欧洲社会的通常含义，它们并未构成一个阶级，而仅仅是一个阶层，而且这个阶层变化无常”（《李约瑟文集》第 57 页）。

[101] 这还是 1938 年时的不完全统计（《马可波罗行纪》第 1 页）。受《马可波罗行纪》影响，1492 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为从大西洋找条去中国的捷径，发现美洲新大陆。1496 年，英国人喀博德为寻找契丹国，走大西洋，到达加拿大海岸。1497 年，葡萄牙航海家伽马为寻找契丹国，发现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第 22 页）。

[102]（法）安田朴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一书，第 2 卷第四章标题为“欧洲依然在中国化”（商务印书馆 2000，第 517 页）。

[103] 耿升：“译者的话”。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 2-3 页。

[104]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第 48-53 页。莱布尼茨的“大构思”曾经提议创造全球统一的宗教——“思想代数”，考虑把汉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 26-30 章）。

[105]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第 53-58 页。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 291 页。

[106] 法国重农学派先后在 1768 和 1769 年，撷掇路易十六和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学中国皇帝的样，行籍田大礼（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第 78、280 页）。

[107]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 306、278-279 页。

[108] 《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第 201-202 页。

[109] 伏尔泰语（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 302 页）。

[110] 《礼记·礼运篇》。

[111] 当然，形式主义的学习效果不佳，是另外一回事情。理论上的重要区别在于，即便是在今天西方社会，政治家发动全体公民学习雷锋式的利他人物，等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完全没有见贤思齐的社会道德基础。

[112] 孟德斯鸠还说：“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等一切细微的行为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 1978，第 313-314 页）。

[113] 太平天国曾经干脆改名为“上帝天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 1979，第 55 页；《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第 409 页）。

[114] 康有为连西方女人结婚改夫姓，都当成男女不平等，大批而特批（《大同书》，古籍出版社 1956，第 234-249 页）。

[115] 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 1956，第 765-838 页。

[116] 韩德强：“50 年：30 年和 20 年”，《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册），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第 580-534 页。

[117] 《李约瑟文集》第 306 页。

[118] 布瓦松称蛮族入侵为“圣经上所预言的那个世界末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灾难，真的是无法衡量的，似乎也是无从弥补的。文明生活，特别在东方，已被推回到野蛮境界。……没有纪律和道德规范来约束这些入侵者，他们只不过把文明的罪恶加在野蛮的堕落之上。远远未能革新世界，他们几乎将文明永远一扫而光。他们破坏了西方有秩序的社会，只代之以紊乱。远远没有带来自由，他们却重建了奴隶制。远远没有减少阶级差别，他们却在阶级间竖起新的壁垒。远远没有改善各下层阶级的状况，他们却使之更为艰苦。远远没有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却在到处从事劫掠、扰乱和破坏，因而毁坏了所有的活动。他们一无建树，而破坏很多，并使一切的进步停顿达数世纪之久。在社会和劳动方面，蛮族人的定居造成了世界上经历过得最大的一次退化”（《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第 30-31 页）。

[119] 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427 页）。

[120] 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曾经强迫贵族剪大胡子、喝咖啡、说法语，竭力西化。广大农村的主导社会形态一直是李普曼式的村社。利用这个“落后”的基础，斯大林顺利推行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直到今天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集体农庄仍然没有瓦解。经历了十年时间的祖国分裂和经济崩溃，俄罗斯逐步开始新的改革——“对叶利钦的改革进行改革”。究竟属于欧洲还是亚洲，长期困扰俄罗斯。十年改革的痛苦，再次证明照搬西方不是出路（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

[121] “官商经济一体化”是日本政府和民间正式的公开描述。为此，美国商业部著《股份公司日本》一书，言下之意，整个日本就象一家股份公司一样政企不分，统一行动（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122] 关于台湾经济“起飞”的西方经典之作是 Robert Wade: 《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政府的角色》（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0。

[123] 关于南韩经济“起飞”的西方经典之作是 Alice Amsden: 《亚洲新巨人：南韩和新工业化》（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s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9。

[124] 经典之作莫过于两卷本 1600 页的《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世界书局 1998-2000。

[125] 《李约瑟文集》第 1037 页。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126] 按兰德公司预测，不算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只要保持稳定发展，到 2015 年，GDP 将达 11-12 亿美元，赶上美国，占全球产值的四分之一（孙津：《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第 307 页）。

[1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41 页；第 15 卷，第 545 页；第 7 卷，第 265 页。